

● 杨芳 著

仰望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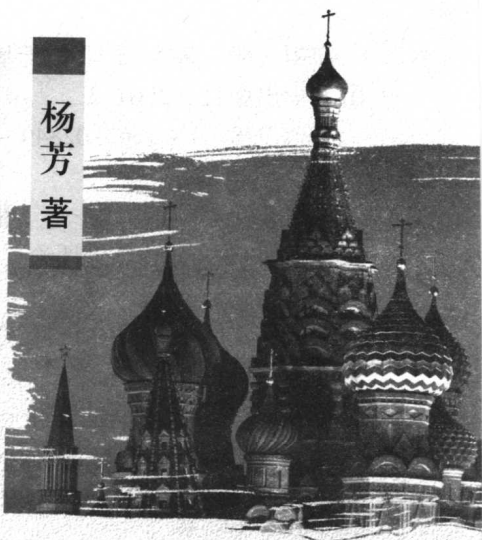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

中山大学出版社

杨芳 著

仰望天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杨芳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3

ISBN 978 - 7 - 306 - 02849 - 5

I. 仰… II. 杨…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 ~ 1881) —哲学史—思想评论 IV. B51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350 号

责任编辑：董 真

封面设计：周 明

版式设计：深 蓝

责任校对：鲁佳慧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真：(020) 84036565

印 刷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850mm × 1168mm 1/32

印张字数：11.5 印张 265 千字

版次印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印数：1 ~ 3000 册

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我知道，杨芳起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的课题，是在三年前，那时她从我为师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读三年来，她几乎收集并阅读了陀氏的全部著作，表现得极其勤奋、刻苦，以至于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深深的感染，这正是她能够写成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我为她的收获感到欣慰。

在俄国历史上，19世纪是“天才的世纪”，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他们视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己任，为“俄罗斯向何处去”问题而苦苦思索，从而促进了俄国历史哲学的大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众多知识分子中杰出的一位。他不仅是世界驰名的文学家，也是俄罗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已得到世界的公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既体现了俄国哲学以文载道的传统，也是在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表露自己思想的唯一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体现了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特点，内含道德、上帝、人、民族四大问题，是当时社会理性与信仰、物质与精神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反映。没落的贵族家庭、癫痫病的折磨、苦役的历练，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是他不断吸收优秀思想的结果，是俄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圣经》是其思想的源泉。他是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浸润中,依靠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成长起来的,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发表《时代》声明以及关于《普希金》的演讲,是他历史观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标志性的事件。

作者把根基主义和拯救精神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的主题,这是对的。为拯救深受苦难的俄罗斯,陀氏在危难之中求助于上帝和爱,力求把神性真理应用于人类生活,为现实社会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们,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找一条道德的出路,一条更新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以东正教为背景,以信仰为前提,以民族为支点,以人民为根基,通过个人道德的完善和兄弟般的爱,把人类引向和谐,引向未来的“黄金时代”,让所有人都过上前所未有的无限幸福的美好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宗教情结,是弥赛亚意识的典型体现,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是东正教神学历史观,是对东正教的教义做出的服务于俄国和未来的诠释。

在推崇理性、信仰动摇的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逆流而动,揭示了理性的局限性。他对理性的普遍性和强迫性提出质疑,认为依靠理性无法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毅然举起信仰的旗帜,指出信仰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是民族振兴的保障,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俄罗斯,只有依靠信仰人类才能得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俄国人民,认为只有在受苦受难的俄国广大平民中,可以找到朴实的德行、善良的风俗、纯真而活生生的信仰,他们是民族历史的基本力量。他将俄国人民

与东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民的力量来自于东正教，来自于基督，人的使命在于凭借信仰克服罪恶成为道德完善的人。人走向神性之路，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不断的道德净化之路。他呼吁上层社会与人民的结合，呼吁上层社会在感情上尊爱人民，在思想上引领民众。他还意识到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要求给农民分配土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俄罗斯在世界中的使命。在他看来，欧洲已经没落。他将欧洲纳入俄国的视野，使其成为“俄罗斯的欧洲”。他坚信，俄罗斯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东正教之光将照亮全世界，俄罗斯将以基督的爱实现全人类的统一，建立一个基督的王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的主要缺陷是忽视了物质生产和人类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极力维护人的自由，注重精神，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这些仍能给予我们启迪，依然是今天人们应付社会变迁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当我仔细读完杨芳的这部著作后，陀氏的那种“把俄罗斯人的注意力拉回到个人的灵魂深处，揭示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中最隐秘的存在”的意志力，深深震撼着我。我似乎看到了陀氏为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在奔走呼号；看到了陀氏对“二二得四”和自然规律的蔑视，对“墙”的不屑一顾……然而，这一切离不开陀氏“仰望天堂”的牢固信仰——他告诉我们，那是人们真正自由的希冀和归宿。

这本书，最终传递了“仰望天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信仰的信息。

李尚德

2007年1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序

序

第三章 唯有上帝能够拯救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动力说	(144)
第一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的质疑	(145)
第二节 理性与信仰的对抗	(164)
第三节 信仰的确立	(178)
第四节 上帝的救赎	(195)
第四章 人民及其所信奉的东正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论	(208)
第一节 人民和宗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	
.....	(209)
第二节 “神人”拯救历史	(228)
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实现	(240)
第五章 以基督名义的全世界统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历史使命观	(259)
第一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西方	(260)
第二节 俄罗斯民族的全人类性	(278)
第三节 用温和的爱顺应历史	(294)
结束语：伟大的殉道者	(318)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42)
后 记	(355)

引 言

俄罗斯黄金时代的哲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天才的辩证法家，
而且还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

——别尔嘉耶夫^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位俄罗斯人。自 1993 年以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中心和莫斯科社会和经济研究所每年联合举办一次“俄罗斯向何处去”全俄研讨会，专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出于从先人那里获得启迪的渴望，学者们纷纷把目光投向 19 世纪曾深入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一批知识分子，从而对真正形成于 19 世纪的俄国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历史哲学是当下俄罗斯可供选择的重要资源之一，它不仅是“后视镜”，而且也是过去向未来的有目的的投射。正如俄国思想家休金所说：“一个半世纪前，使俄国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绞尽脑汁的二者

^① Nicholas Berdyaev: Dostoevsky (trans. by Donald Attwater), New York: Living Age Books, 1957, p. 11.

必择其一的抉择，最近一些年变得更为现实了。为了确立自己在整个欧洲大家庭的位置，俄罗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自己的千年历程。”^①

第一节 天才的世纪

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的 19 世纪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一个尖锐地分裂的世纪”，它最大的特点是“内在的解放和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②可以说，19 世纪是俄国“天才的世纪”，文学之盛，思想之盛，空前绝后。但要探讨这个世纪的思想和文化，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改革。从历史的角度看，彼得大帝的改革为 19 世纪思想和文化的大发展作了准备。

彼得大帝改革的俄国历史进程大转折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以沙皇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状况后，抛弃俄罗斯因循守旧、闭塞自大的传统，仿效西方，实施了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彼得大帝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亲自倡导和主持了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虽然，300 多年

①（俄）休金：《俄罗斯西方派的文化世界》，商顺英、杨世昭译，载《哲学译丛》1993 年第 4 期，第 74～80 页。

②（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修订译本），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3 页。

来人们对彼得大帝的改革褒贬不一，但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国文化的一次大转变，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俄罗斯启蒙时代的开启

在彼得大帝的所有改革中，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引人注目，社会影响也最为深远，可以说，“西方文化在俄国传播的决定性步骤是由彼得大帝实行的”^①。彼得大帝试图使俄罗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文化的熏陶。改革打开了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大门，哥白尼、伽利略的学说进入俄国，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谢林的学说在俄国广泛传播，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使俄罗斯融入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俄国从自己民族的偶像崇拜转向了‘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之分’的一般人类信仰，从而抛弃了多神教的孤立化和封闭性，承认自己是统一人类的组成部分，认清了人类的真正利益，加入了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②

彼得大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学习，先后开办了工程技术学校、航海学校、造船学校、海军学校等专门学校，主持创办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所世俗学校——彼得堡学院、第一份报纸——《新闻报》、第一座图书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座公共剧院和第一个印刷所。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人身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大力推行欧洲的生活方式和时尚，

①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352 页。

② （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7 页。

剪掉了俄国人视为“上帝赐予的饰物”并引以为荣的大胡子，要求贵族和市民穿欧式服装，破除了一些束缚妇女的旧风俗。彼得还将俄国采用的教会历改为许多欧洲国家通用的儒略历。

彼得大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改革措施，促进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它在“欧洲主义”中认识到了自我，开启了俄国的启蒙时代，造就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为19世纪独特的俄罗斯思想和哲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索洛维约夫曾特别指出彼得大帝改革对俄罗斯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他在《维护彼得大帝》中强调：“没有必要证明，我国现有的教育程度和俄国文学的全部宝库，都应当归功于彼得改革。如果这里可能有某种问题，那么过去和现在的俄国教育和文学的最伟大代表——罗蒙诺索夫和普希金，就已经回答了，他们的名字是与彼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

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西化

彼得大帝改革是俄罗斯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开创了近代俄罗斯欧化之路，还引发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东方性或西方性问题，这一命题成为俄国历史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刘祖熙深刻的分析道：“彼得改革的结果、它的历史意义，更多的不在于它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程度，而在于它改变了俄国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此，俄罗斯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西化历程。俄国像一艘新下水的大船，在彼得这一有力舵手的驾驶下，驶向欧洲大家庭。”^②

①（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②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从公元10世纪的基辅罗斯立国开始，俄罗斯就走着一一条明显的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发展道路。普列汉诺夫说：“俄国仿佛是动摇于西方和东方之间。”^①有人更形象地将俄国历史发展道路比喻为“钟摆”，认为自俄罗斯诞生至今一千多年来，其社会历史发展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忽东忽西，象一个巨大的钟锤，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的方式使俄国人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彼得大帝的“亲西方改革”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使俄国历史走向了急速“西方化”阶段。正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起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之争，即新、旧俄罗斯之争。这种争论实际上是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的前奏，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尽管没有决出胜负，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天平却明显倾斜于西方派。

独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彼得大帝改革后，面对西方的冲击，一批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就俄国的现状、出路以及俄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涌现出从拉吉舍夫、

^①（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页。

恰达耶夫到斯拉夫派、西方派以至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者等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群。

恋女与情郎——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彼得大帝改革后开始形成的，是彼得大帝改革的产物。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彼得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是“彼得的孩子，我们中有他，他中有我们”^①。赫尔申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形成于彼得改革时期。”^② 费多托夫强调：“知识分子是随着彼得改革而产生的，这已是广泛的社会意见，知识分子是彼得的产物，合法地继承了他的遗产。”^③

俄罗斯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俄罗斯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涵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它所指的并不单单是从事脑力劳动、脑力创作的人，而专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人”。在俄罗斯属于知识分子之列的完全可能是不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在思想意义而非职业和经济意义上的划分，它由各种阶级成分组成。评价一个人是否是知识分子，主要依据的不是它所从事的活动是否是脑力劳动，而是根据是否具有救世情怀，是否关心祖国的命运，是否有批判精神，能否主持正义、同情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能否积极探求并解决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

①（俄）梅列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李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 页。

②（俄）赫尔申宗：《创造性的自我意识》，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 页。

③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5 页。

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爱国主义和忧患意识是俄国知识分子最突出、最可贵的品质。即使惨遭迫害、流落他乡，在俄国知识分子心中，祖国仍然是第一位的。高尔基非常形象并准确的用恋女和情郎来形容俄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深深眷恋之情，他说：“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① 司徒卢威指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意义是由他们的思想及其现实表现中的对国家的态度所决定的。”^② 赫尔申宗更进一步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指那些由于年轻而情绪失常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其个性之外的某种东西视作自己的兴趣，同情唯一具有价值的对象——它们是民众、社会和国家。”^③

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以及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的深深忧虑，使得俄国知识分子视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己任并时刻准备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他们中有的人放弃了贵族的特权，与人民同甘共苦；有的人甘愿坐牢、流放，甚至献出生命，也矢志不移，无怨无悔。布尔加科夫在《路标》文集中专门指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写道：“我们的知识阶层认为有义务去扮演自己祖国的上帝角色。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中，自己是上流社会和欧洲教育水准的唯一代表。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黑暗所笼罩，一切都是那样野蛮、与自己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自己是这

① 张建华：《恋女与情郎的永恒对话——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见文池：《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② （俄）司徒卢威：《知识阶层与革命》，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③ （俄）赫尔申宗：《创造性的自我意识》，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个国家的精神监护人，并且决定就其理解和能力去拯救这个国家。”^① 别尔嘉耶夫也特别谈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和理想主义，他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被判处死刑时的一段回忆，可以说是俄国知识分子这种殉道精神最典型的证明：“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站在刑场上听取判决时毫无后悔。当然，我不能证明全体都是如此，但我觉得当时，在那个时刻，如果我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那么至少也是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放弃自己的信念是可耻的。”^③ 就连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也这样评价俄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④。

可以说，俄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行动和殉难史证明着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不公正现实的抗议，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俄国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祖国和民族

①（俄）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修订译本），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页。

③（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代的一种伪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刘季星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④（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当作形而上学思考的对象，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着俄罗斯的命运，不管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多大，观点怎样敌对，但他们的心都为俄罗斯而跳动。正如赫尔岑在安葬阿克萨科夫时的悼词中所讲：“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霍米雅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如果说，他们未能拦住彼得发出的那辆军用马车，以至比龙^①仍安坐车中，驱使车夫把车子驶进麦田，辗死百姓，那么，他们已唤醒了迷惘的舆论，迫使一切严肃的人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了。俄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从他们开始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②

精神的苦斗——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列宁指出：“大约在前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这50年内，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反动的沙皇专制压迫之下，贪婪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③ 19世纪是俄国思考的世纪，苦苦寻求出路的世纪。作为人民中的精英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在俄罗斯，从恰达耶夫到明智的思

① 埃·约·比龙：安娜女皇的宠臣，安娜女皇时期，以比龙为首的一批德意志贵族在俄国宫廷得势，推行“德意志化”政策。

②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